



# 马相伯与辛亥革命

李 旻

马相伯出生于镇江,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 一、马相伯传奇的一生

第一,他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经历较为独特。马相伯出生于镇江,原籍丹阳马家村。与一般的家庭不同,他的父母都信仰天主教,他一出生就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教徒。这样的家庭背景,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父亲马松岩当时在镇江城内经商,兼做中医,马相伯5岁时和一般的小孩一样在私塾里接受启蒙教育。只是到了12岁的时候,他进入上海徐汇公学学习,这所学校是法国天主教教会创办的,课程除了中国传统的经学外,还有拉丁文和法语、数学、哲学等。在徐汇公学10年多的学习中,马相伯表现出色,获得圣学奖和西学奖,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功底。此后,马相伯进入耶稣会神修院学习,1870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并进入耶稣会成为神父,后不满教会里外籍教士的歧视及其他一些原因,1876年退出耶稣会,开始世俗的生活。

第二,马相伯的一生可谓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马相伯生于1840年4月7日,非常巧合的是,这一天英国的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议案,同意英国政府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鸦片战争,它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开





端。依据中国的传统习惯计算,他整整活了一百岁。1939年11月4日在越南凉山去世。在这100年时间里,他经历了清朝五个皇帝的统治(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溥仪)时期。见证了清王朝的灭亡,中华民国的诞生。经历了北洋军阀的分裂割据,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相伯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同龄人。

在政治上,晚清时期他做过李鸿章的幕僚,朝鲜国王的顾问,中国驻日本参赞,足迹遍布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对西方的科学和工业文明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支持维新变法,投身清末立宪运动,被选为江苏省谘议局民选议员。武昌起义爆发后,积极响应,致力于光复南京,江苏都督府成立后,曾担任外务司长、内务司长等职。担任过袁世凯政府时期的总统府高级顾问、参议院参议、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度做过国民政府委员。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断断续续,长达65年,在同时代政治家中可谓罕见。

第三,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马相伯有着特殊的贡献。他坚信“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毁家兴学,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等学校。马相伯一生担任过三个大学的校长,即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马相伯办学的理念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提倡学生自由研究探讨。给教育界注入一股新鲜的空气。

第四,耄耋之年,积极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不顾90岁的高龄,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电台发表十多次演讲,还多方筹集物资支援前线抗日将士。其爱国精神得到社会各界肯定。百岁生日时,国民政府给他颁发了褒奖令,中共中央称赞他是“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的弟子及社会各界人士更是盛赞其“生死护中





华”。1952年,陈毅陪同其家属将其灵柩迎接回国,安葬在上海。

## 二、庇护革命青年,保护革命力量

20世纪初期的上海,志士云集,革命救国声浪日益高涨。清政府对此严加镇压,不时逮捕革命志士。1903年炮制的“苏报案”就是一典型例子。对于有革命志向的青年人,一般学校不敢收容,马相伯却我行我素,说:“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1904年夏天,马相伯接收于右任进入震旦学院读书,就是很好的例证。于右任原是清朝举人,家住陕西三原县,因受革命思想影响,在赴汴梁(今开封)会试前作了一部《半哭半笑楼诗钞》,讥讽时政,激怒清廷,被通缉,遂星夜出逃,来到上海,寄人篱下,生计维艰。马相伯得知消息,派人招之入学,还豁免了他的一切费用。当时正是“苏报案”之后不久,文网苛密,有些人担心让于右任入学有风险,马相伯不以为然,他大笑对于右任说:“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作东道主矣。”马相伯对待革命的态度可见一斑。

## 三、积极推动南京光复

(一)保护有革命倾向的新军第九镇。打响武昌起义枪声的是新军第八镇的官兵,在此影响之下,驻扎南京的新军第九镇官兵也跃跃欲试。当时,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江南提督张勋鉴于各省起义都由新军发动,所以对第九镇新军加以防范。先是张人骏命扣发该军弹药,后张勋又调集了江防军三个营的兵力,在新军三十三标周围布防,并在标房后面的猫儿山、狮子山上架起了大炮,炮口对准新军的营房。同时,对南京全城实行戒严,





一时人心惶惶。1911年10月28日,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到督署衙门以家小为质要求发给弹药,遭到张人骏拒绝,张勋还以缴械相威胁。徐绍桢当时即与张勋争执起来。双方僵持不下,形势对新军十分不利。就在此时,马相伯利用和张人骏的旧交进行营救。他会同前总督端方的幕僚伍兰荪、江苏布政使樊增祥,向张人骏建议:江防军与新军矛盾很大,终不免要起冲突,为缓和计,不如把新军调往城外,两军相距较远,冲突自可消弭。张人骏遂下令将新军第九镇调往秣陵关,这支新军得以保全。当时担任第九镇三十三标军官的程家模,后来追忆这段历史曾感叹道:“当日保全九镇新军,即保全革命元气,伍兰荪、樊增祥、马相伯三公之功不可没也,光复南京三公实与有力焉”。后来这支军队在秣陵关起义,起义失败后,退驻镇江,与其他军队组成江浙联军。

(二)协调江浙联军内部矛盾,帮助江浙联军攻克南京。自武昌起义后,上海、苏州、镇江以及浙江的一些城市相继起义,南京则成为清军东南顽固堡垒,张人骏、张勋恃拥兵万余,企图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加之南京处于长江要隘,清军如溯江西上,两湖形势将更加危急。为了支援武汉前线,巩固东南既得阵地,进而挥师北上,陈其美与徐绍桢商议后,又与苏军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等商量,决定组织江浙等处民军,会攻南京。沪军都督府商议推举徐绍桢为进攻南京总司令。11月11日,徐绍桢从上海乘火车到镇江,集合各方代表会议,组织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先后到达镇江归其指挥的除林述庆所部镇军外,还有朱瑞统率的浙军、刘之洁统率的苏军、洪承点统率的沪军、黎天才统率的辅军等部队,共计一万余人。江浙联军组建后,联军内部矛盾重重。“将异其志,卒异其系,谋士异





其略”。各路部队各有打算,其中尤以林述庆与徐绍楨的矛盾最为严重。林述庆原是徐的部属,且徐在福建任讲武堂总办时,林为福建讲武堂学生,得到提携较多。但是,在江浙联军组建前,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已经相当尖锐。武昌起义后,时任第九镇十八协三十六标一营管带的林述庆,在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所派代表李竞成等革命党人的帮助下,率领十八协驻镇江的五个营并动员其他零散军警起义,光复了镇江,并出任镇军都督。而徐在转向革命过程中的迟疑不决,使林十分反感。镇江光复后,林“本来抱有镇江独立的思想”,把镇江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徐插手。加之,徐第九镇秣陵关余部败退到镇江后,林乘机收容第九镇余部并入镇军,实力因之增强。此时,林述庆当然不再欢迎赤手空拳的徐重新回来做他的上司。因此,江浙联军组建后,在每次军事会议上,林与徐总是“意见冲突”。11月19日,林再次借口徐“主张立即进攻”,“镇军因准备未完,不能成行”,甚至发表通电,公开反对徐绍楨任联军总司令。徐绍楨也觉得统率这支部队有困难,要求辞去总司令职务。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一度有“改举程德全为总司令,以绍楨副之之议”,但是程德全以“自惭无军事学识,未敢承命”,通电力辞。

大敌当前,面对此种尴尬局面,在江浙联军总司令部中担任交通及筹款之责的范鸿仙、柏文蔚等只得请德高望重的马相伯居间调停。此时的马相伯不仅担任江浙联军外交部长,还作为镇江都督府选派出来的代表赴沪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这一切说明马相伯在林述庆心目中的地位及影响。之后,经过马相伯的劝解与协调,林述庆“稍稍悔悟”,与徐“意见已渐融洽”。沪军都督府也以军情紧急,电请绍楨以国为重,勉任其难,徐绍楨不得已,遂取消辞职意。除



了调和江浙联军内部诸将领之间的矛盾外，作为外交部长的马相伯还积极负责江浙联军与上海总兵站之间的联络、协调工作，不辞劳瘁奔波于沪、宁、镇三地之间。林述庆在《江左用记》中记载道：“二十六日(11月16日)，固卿(绍楨)同马相伯来视余。是日，宋渔父、孙少侯到，互谈约一时许。当时余定有轮船停驶规则，未实行，因商诸相伯，相伯为余指导一切，且云：‘有重要事，可电上海，我即来。’”

(三)平息内部纷争，稳定南京局势。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了南京。联军将领间为争夺都督职位又起冲突。林述庆率先进城驻清总督署，组织都督府，自称江宁都督，“署内驻镇军，不许总司令部之警备队入署”。徐绍楨自不能居其下，而程德全自苏州光复后，即被江苏省临时省议会推为江苏都督，“于是三人大争帅”。“照武昌起义后所颁战时条例，总司令由督委任，徐的资格高于林，且他的总司令是苏、浙、沪各军所公推；而论功以反正先后来说，则林先于徐。以江苏全省来说，程德全九月十五日反正，林述庆九月十八日反正，程先于林，且巡抚辖江苏全省，镇江府向归程辖，程反正后即传檄苏、松、常、镇、太各属反正”。所以，要妥善处理此事甚为棘手。张謇对此就不无感慨地写道：“至沪，‘闻党人外有党，党人中有党，纷歧复杂’。”不过，当时林述庆自称江宁都督，几乎遭到各方面一致反对。在一次会议上，不仅联军总司令部代表四人“对林责备甚力”，浙军代表更是兴师问罪。其实，浙军统领朱瑞也想做都督。苏军和辅军领导人则表示赞成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徐绍楨则摆出一种态度，要求公推都督，言下之意即对林自称江宁都督甚为不满。他在致章太炎、黄兴、宋教仁等的电中说：“此皆群策群力所为，楨无丝毫之力，善后事务极繁，务求诸公推举都督，以图长治久安，俾





楨潜身归隐,没齿铭感。”相比之下,以资望及其对江苏和平光复的贡献而言,程德全膺任江苏都督则是众望所归。但是,由于程德全未亲身参加攻克南京之役,不敢邀功自赏,面对浙、镇军争夺都督的汹涌之势,颇踌躇不决。马相伯从当时斗争形势及政治格局考虑,毅然敦劝程德全出掌江苏政权,并联络士绅,尽力化解各方矛盾。马相伯除了在私下做了说服工作外,还利用公开集合机会,发表演讲,平息纷争。他在劝林述庆等人以大局为重时,就劝告他们当以太平天国的史实为教训。马相伯在演讲中告诫说:“此地就是当年的天京。对于当年天京内讧的往事大家比我清楚。目前,冯国璋几十万大军就在江北。假如江对岸的清军打进城来,我是没活命的,在座诸位又会怎样?我们能做太平天国第二吗?”经过马相伯晓之以大义,林述庆心里渐生惭愧之意,意识到“不自度德量力,遽尸临时都督”,弄得天怒人怨。而且此时,沪军都督府都督陈其美也已复电徐绍楨说:“已公推程雪老(程德全)移驻江宁,为江苏都督,并推林公(林述庆)为出征临淮总司令。东南要人,本党英俊共表同情。”与此同时,陈其美又派宋教仁、于右任等赴宁进行调解。宋教仁劝说道:“倘雪楼(程德全)督宁,一切军需上补充必能极力担任,不使君丝毫掣肘。”于是,林述庆于12月3日深夜发出通电,接受上海方面的意见,欢迎程德全抵达南京,他本人则取消镇军都督名义,督师临淮。随后,徐绍楨则被推为北伐总司令。这样,南京终免一场浩劫。在平息此事的过程中,为了安抚军心,马相伯还与张謇协商,召集省议会,“又有在会各议员捐资购买牛马十头,高粱酒五十斤”,由马相伯、凌文渊代表省议会全体赴宁犒劳联军。

很显然,这场争夺都督风波的解决,不只是马相伯一个人努力



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是,在辛亥鼎革、政局极度动荡之际,联军内部许多人心存争权夺利思想,马相伯则成功地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他以他的人格魅力、政治家的智慧以及极富感染力的演讲口才,化解了许多矛盾,稳定了南京的秩序。晚年的马相伯也曾回忆辛亥南京光复后,一些革命党人和新军的下级军官因互相争功大闹都督府,而他又是如何“和几百个鸡毛帚周旋”(那时革命军将领的军帽都插着一朵白色翎毛,因而马相伯戏称他们是“鸡毛帚儿”),最终帮助程德全解了围,也使即将上演为一场军事斗争的局面恢复了平静。南京的光复,为新生的民国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相伯从救援新军、出任江浙联军外交部长、协调内部矛盾,到促成江苏都督府的顺利组建、稳定南京局势,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南京光复后,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将光复南京出力人员,先后呈请大总统和咨送陆军部稽勋局核奖,在 321 人中“马良”之名赫然在列。马相伯去世时,于右任饱含热泪撰写祭文,其中即讴歌了马相伯在辛亥江苏光复这一段的历史,称其“共和肇建,再起匡时。中山国父,丹徒国师”,高度评价了马相伯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

(本稿由镇江市社科联推荐)



李旻, 1971 年生, 江苏扬中人, 历史学博士,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人物和思想史研究, 先后发表论文 20 多篇, 主要有《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马相伯宪政思想探析》、《马相伯教育救国的思想与活动》、《马相伯抗日救亡的思想和活动》等, 主持和参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当代政治文明建设》、《区域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保护问题——以镇江为例》等课题的研究。

